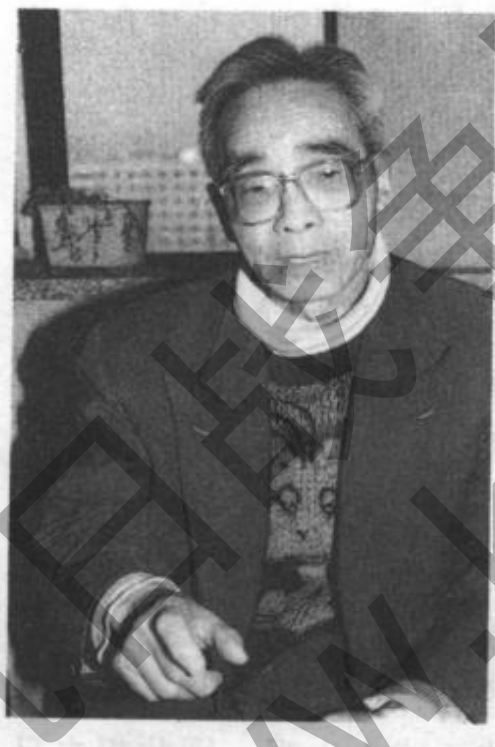


丘成^①

地点：中国社科院哲学所

时间：1995年4月11日



丘成

钟：很高兴您今天有时间给我们讲一讲您当年去日本留学的种种情况。

丘：我原是香港居民。我是5岁时到的香港，我祖父是在19世纪到香港去的。后来到1949年我回到大陆，前后一共在香港17年。我为什么到日本去？我是在1935年10月到日本去的，在此之前，我在香港读私塾，读《四书》什么的，13岁才进新式学堂，才进初中。16岁我进华声英文书院，因为我父亲希望我能学英语来做生意，香港是殖民地，英语有用。我

①丘成，1917年生，香港人。1935年留学日本，1937年7月回中国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，中华日本哲学会理事长。

是不大愿意学英语，也只好学，从16岁到18岁，从四班学到二班（一班最高）。由于上课时间不紧，我开始读一些社会科学书，因为我看到殖民统治给人民带来的痛苦，工人很辛苦，我自己也有受侮辱之感。英国人用锡克族人来管香港治安，他们是亡国人，我们还受他们管，所以觉得受辱。

我看了不少社会、经济、哲学书，像中译本的《资本论大纲》、《社会意识大纲》、林伯修译的普列汉诺夫著的《史的一元论》、李季译的《马克思传》等，对我的人生观的形成影响比较大，看到这些书多是从日本重译来的，就想可能还有日本没译的马列书，就想到日本去看一看。还有，我那时对孙中山先生也很崇拜，我看过他的演说集，他的一些话给我印象很深，他的政策我也大体知道，所以我越来越向往。香港是个文化沙漠，有点书也多是从上海去的。我也想去苏联，因为苏联宣布放弃对中国的租界特权，但是距离太远了。一句话，我去日本，是为了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。

钟：那么，有个问题，那时英美哲学书也多，您看不看？

丘：我对英美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好感。我尊敬圣人，也大体知道一些西方哲学思想，但我思想的主流是从进步文学到马克思主义。老实说，也比较乱，书很多，搞不清楚，家里父母也不知道。1927年“四一二”政变以后，广州反动派拍了一部影片，叫“共党祸粤记”，我看过，说共产党怎样怎样，反动宣传，我看了没受什么影响。为了要找正确人生观，因此想去日本。

1935年上半年，我不读了，要求结业，学校就给我开了一个修学证明。我还希望到广州进中山大学，就到广州打听。那时陈继棠的统治很腐败，我去中大找一位同宗的叔父，他在校内管注册。他同我说，从香港来的学生一般水准不够，很难考

上。他劝我不如去日本，他说他的哥哥将从日本留学回来度假，你如想去，可叫他带你去。不久我在香港见到他哥哥，我这叔父也欢迎我去，说日本有一种读书的好风气。这样说动了我，我就同家里讲想去日本学习，家里同意了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开始学习日语，是一个华侨教的，用世界书局出版的自修用日语教材，有五六本书，打了基础。

我上船时，带了一位赵姓同学在美国买的《资本论》英译本，以及一本商务出版的考茨基^①著的《唯物史观与道德》。船离岸时，人们拿各种彩色纸带抛下来，互相拉着，看着挺新鲜。在船上看一些说明书，大体能懂了，也感到学日语能用上。还有，吃饭时，用的勺子是扁平的，同中国的不同，也留下印象。船经过台湾时，还停留一个小时。等到了神户上岸，过海关时，我的书查了一下还给我了，没事，我叔父也才放心。我们去坐缆车上六甲山看了一下。对日本的第一个印象是，日本岸边的妇女穿着漂亮的和服，体态丰满，挤在人群中活动，构成一幅绚丽的画面。日本的木结构房子也感到似古代中国，挺清爽的。

上火车去东京时，我同一位乘客用英语讲几句话，他一句也不懂。看来一些游记上说，在日本可以用英语到处游玩，不一定对。只有学好日语。到东京，我开始住在小石川区，从10月中旬开始，到神田东亚日语补习学校去上学。房东对我们挺客气。到现在，我对日本老百姓都没有恶感，他们都是客客气气的。住没几天，警察来了，他不会中文，我不会日文，他是来问我到此的目的，最后还用英语向我道歉。我每天早上乘电

^① 考茨基(K·Kautsky, 1854—1938)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，理论家。著作有：《婚姻和家庭的起源》(1882年)、《卡尔·马克思的经济学》(1887年)、《土地问题》(1899年)、《伦理学和唯物史观》(1906年)、《无产阶级专政》(1918年)、《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》(1919年)等。

车去神田上课，在车上有许多小学生、中学生，他们一面用手扶着车，一面拿着书本在看，读书风气相当厉害，这个国家强盛，原来有这么多人在学习。我产生一种敬佩之情。

东亚学校的老师，记得有一位穿着和服，经常面带笑容。他用我国的普通话讲解日语，他的普通话说得比我好。还有一位老师在上课时告诉我们：学外语（包括日语）嘴唇要薄，脸皮要厚。就是要大胆多说的意思。课本是用松本先生编的。英语我在香港时没有好好学，现在我主动来日本，就得好好学日语了。我把井上翠编的《日华字典》，红皮的书，从头到尾通读了，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死背。另一本是《华日字典》，服部操编的。我在晚上全背字典，跟小时背《论语》一样，日语基础就打好了。开始在神田上学，中午就到附近青年会的食堂吃饭，便宜，没有炒菜。我看穷学生是买一碗饭，一碗酱汤，一个生鸡蛋，把鸡蛋打进饭里，用筷子拌得滑溜溜的就吃了，我也就跟着学吃。后来我们四个同学合住开伙，用公筷，自己用勺子，挺卫生。住地的厕所是在外面，用木板隔开，不是用马桶，但特别干净。

第二年春天，我在东亚学校毕业，我叔父劝我进高等学校为好，我就报考一高的文科。考试有作文，题目是“我的朋友”，用日文写。还有将英文译成日文和其他的。我居然考上了，我的苦学有用了，我的古汉语知识也用上了。我的印象是，中日两国文化是密切的。中日的语法距离远，但日语里汉字多。1936年的“二二六”事件我赶上了，是在报上看见的，具体不了解。被杀的大藏大臣高桥讲过一句话：“如果日本的预算超过了100亿元，日本会亡国。”理由不明白。当时从报上看是很紧张的，附近倒是很平静。

3月开学进了一高，到学校交学费，10几块钱吧，便宜。开始进校住寄宿舍，“老前辈”们在桌上用粉笔写鼓励的话，例如

“要认真学习”。开学典礼很庄重，早上就列队，一站就五六个钟头，校长、老师在上面讲，我在下面听不懂，真累，旁边的老学生看见就会大声吆喝。我进的是特设高等科文甲，是学校为留学生特别安排集中的，特设高等科专门有一栋两层楼给中国学生上课用，在生活上则不分别，甲是英语的意义。生徒主事是竹田复先生，规定有一套学生自治的办法，学生的将来是要去治国的。我们大家光着头，穿高木屐，长黑袍，走路一歪一歪的，但很神气，自认是天下的秀才，以蛮为荣。后来我学习哲学才知道，日本人是提倡日本主义，一高提倡学生质朴而刚毅，学习风气很浓。一高学生自治会经常贴出通告：“必须高唱寮歌！”因此校园内经常歌声不断。我记得一首歌名是：“啊，玉杯”。一、二段歌词是：“啊！玉杯盛鲜花，月光映绿酒，眼下的荣华俗世陶醉于太平安逸的美梦中，我们五寮的健儿却高高站在向冈之上，意气冲天，……一旦奋起，世间伟业何事不成？”晚上在宿舍睡觉，有时半夜里会有几个高年级学生进来喊大家起来，听他们喊，经常受他们申斥。而教谕们很有学问，认真负责，有位老师的中国话讲得比我还好。

我慢慢地适应了环境，就转向自己的志愿，到旧书店看书，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袖珍本。我还学德文，晚上去图书馆偷偷看马列的书。老师教课是好，有一次，老师讲“范畴”这个词，说是从中国古文“洪范九畴”引来的，大田野变成抽象的大范围，比“概念”还大。这一类的用法很多，日本学者发展了中国古文的近代应用。还有一次，偶然写作业，我用了个“概”字，我以为是对的。龟田老师在黑板上纠正我，是个“概”字。我感到惭愧，我是个中国人，让日本老师来纠正我。以后我就发奋，凡有字句上一点问题，我都去查字典，搞个明白。我从日本老师那里学习认真的作风。老师们备课认真，教学认真。现

在似乎有点改变。

钟：我认为有一个文化观念标准化问题，日本人在一个时期里使用一种同样的概念，全民族共有，约定俗成，从字典开始。

丘：连《日汉字典》也是日本人编出来的。他们把许多中文引过来，省了我们的力气。

后来我和一位姓廖的同学，在外面租了间屋子，出来公开看马克思主义的书，日德对照的。我们真是如饥似渴地学习。我想翻译一些东西，走写作的道路。我也参加过读书会，读一些书再讨论。我们不读唯心论的书，只读唯物论的书，是共产党领导的。有一次我们成员到早稻田大学附近食堂聚一聚，后来才知道是传达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：要抗日，放蒋介石，组成抗日统一战线。是给我们一个解释。快到1937年7月时，发生一次事，是在青年会开会，有50—60人参加，有人在台上抢打起来。散会后，100多进步学生上街游行，中心口号是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，大家走到中国大使馆，派代表去见徐世英大使，他是个老夫子，像个冬烘先生。当时日本外相广田提出对华三原则，十分蛮横，徐大使则要求日本政府学《论语》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像个学究说话，有什么用？谁听你的？

进一高特设高等科后不久，我被同学选为学生会主席。我开设了一个中国书报阅览室，从上海邮购了一些图书，也订了一些杂志，供同学们课余阅读。没想到，这个阅览室日后成了日本警察当局迫害后来同学的借口。当时留学生没有想到打工挣钱，主流是爱国的，回来抗战的也多，当然也有当汉奸的。

七七事变时，我在街头看见号外，上面写着：“膺惩暴支”，中国人反倒成了暴徒，实在难以忍受。到现在我还有印象。到7月中旬，我就同许多中国同学坐船回国，先到上海，再回香港了。